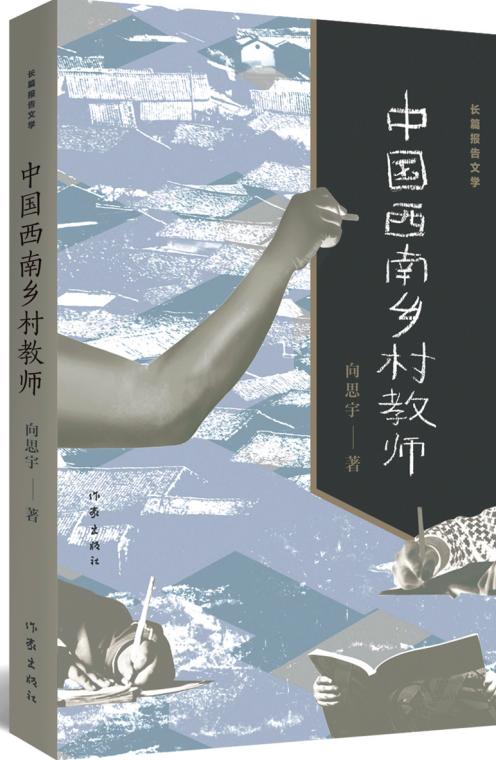


■长篇报告文学

## 中国西南乡村教师(节选)

□向思宇



这是一本极具现场感的真实手记,这是一段探寻当代中国乡村教育的崎岖征程,这是一部翔实记录云贵川三省边远贫困地区教育现状的呕心力作。

乡村教师,这个被冷落、被忽视的群体,全凭一份责任与仁爱之心,数十年如一日地扎根在贫瘠的土地上,坚守在简陋的教室里。他们作为教师播撒知识的甘露,让广大农村孩子懂得了写字、学会了数学,有了走出大山的可能。他们作为“家长”哺育爱的营养,有的一边务农一边教书,有的每天走泥泞的山路送小同学回家,有的用少得可怜的工资补贴学生,还有的倾家荡产创立民办学校,只为当地孩子可以在安全地上下学……

他们其中大多数都是不受制度保障的民办教师,或称代课教师,被人们称之为“教书的农民、种田的教师”,是我国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群体。近些年来,这一群体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本书通过深入挖掘民办教师的来龙去脉,将其历史沿革、现状、精神世界、政策流变及未来愿景一一梳理清晰,既客观平和,又充满了深切的人文关怀。它让我们看到,中国的乡村教师是一个值得全社会向其致敬并且礼赞的群体,在中国义务教育发展路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。

在贵州,在铜仁地区,德江县煎茶镇新场村都是个毫不起眼的小山村。有一天,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山村突然来了好多人,这么多人的到来让偏僻闭塞的山村一下子喧嚣,不不,是悲痛起来,那一刻,整个山村陷入了一场空前的悲痛,因为一个教书21年的代课教师积劳成疾去世了。

这一天是2010年4月18日,因病去世的代课教师叫周明道。

几天后,举行了追悼会。周老师教过的学生,近在本地的来了,远在贵阳等地的也来了。还有青岛海洋大学支教团的代表、煎茶镇教办的领导……

追悼会上,六年级学生杨丽在泣不成声地念着写给周老师的悼词。

杨丽在悼词中说,每当听见周老师用木棒敲击铧犁——煎茶镇新场村望海小学(先前的桂花小学)上下课的铃声是木棒敲打铧犁的声音——我总会想到吆着牛在地里犁地的爸爸。周老师先前也是农民,当过农民的周老师教书教得这么好,为什么就没有转正呢?

这话让在场的所有人揪心!

杨丽,周明道教得最长的一个学生,从学前班一直教到六年级。

杨丽跟我讲,周老师给他们上语文、数学、音乐、体育,还上毛笔字课。讲着讲着,就流泪。

课堂上,周老师手拿课本,借助教室房顶“天窗”透下来的光——这儿停电是常有的事——给学生们上课。教室里的长条板凳是周老师附近村民的木板凳,高一些的用来当桌子,矮的就做了椅子。

下雨天,破旧的房顶透着风也漏着雨,从房顶漏下来的雨水将师生们浇成落汤鸡是常有的事。

起风时,山风呼啸着,扒打在教室墙壁上,将糊在手指头宽窄的墙壁缝的旧课本纸刮得噗嗤作响……

终于走进了教室。

坐在这儿的教室,不用听课,心灵就被一种东西给震慑住了。

其实,在没走进教室前,我就被震慑住了。教室旁边那块长满了荒草的杂草地,草地边上是用石头垒起的乒乓球台桌……台桌边的水泥墙壁上嵌着用瓷砖拼凑的世界地图——学校唯一奢侈铺排的东西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我怎么也不会把偌大的“世界”同中国最贫困的山地省的区区一个村小联系在一起。“世界”与“村小”,如此大的反差场景同时在一地出现,恐怕只有在神奇的魔幻世界中才会有!

刚刚下了一场雨,雨水混淆了“世界”的“亚洲”和“大洋”的边界,但世界地图旁边“放眼世界”几个鲜红的大字却像一束电焊弧光强烈地刺痛了我的眼睛……

待情绪稍为平静后,我继续跟身旁的杨丽打听周老师上课的事。

“周老师平时是怎么给你们上课的?”我说。

杨丽歪着头看我:“就是专心地仔细地教我们呀。”

“早上从几点钟开始上课呀?”

“七点半。”

“下午呢,下午从几点到几点?”

“从两点到四点半。”

“一整天的课都是周老师一个人上吗?”

“是。”她说。

“我们班男生杨旭林,他家妈因难产而死,他家爸在他两岁时生病去世,杨旭林从小与他家姐和年迈的爷爷一起过日子。他家姐15岁辍学后,就一直在广东打工。2011年冬月,杨旭林家爷爷去世。如今,他家就只剩下12岁的杨旭林了。”

杨丽在领我去周老师家的路上,跟我讲起班上同学杨旭林与青岛支教团的哥哥姐姐的故事——

“2011年寒假的一天,青岛海洋支教团的几个老师,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去杨旭林家看他。他们见到杨旭林时都不敢相信他是六年级的学生,那么小点点个、干瘦干瘦的。老师们问杨旭林的生活情况,他就哭了。你问我为什么要哭,这我就不晓得了,好像是他家爷爷生病后,家里的活就是杨旭林一个人在干了,又要洗衣服,又要做饭。我听说有老师要帮他找一个条件好一些的家庭,但杨旭林不干,说是他家再穷也要待在家里,哪儿都不去。”

“要是你呢,你会怎样?”我试探着问杨丽。

“我觉得杨旭林好有骨气。”身旁的杨丽抬头看我一眼,“要是我也会这样做的。”

支教团老师离开那天,我们班上的几个男生一大早便上山抓蛇去了。你问抓蛇搞哪样?招待支教团的老师呀。我们这儿穷,拿不出哪样东西招待客人,上山抓蛇是最好的招待。

“上山抓蛇?就不怕被蛇咬伤吗?”

“没得事,多数情况下不会被蛇咬,顶多被杂草划伤手臂。”

“那——抓到蛇了吗?”

“抓到了一条。”杨丽说,“几个男生拎着打死的蛇从山上来站在支教团老师面前时,老师们吓坏了。”

听着杨丽讲班上男生上山抓蛇招待青岛海洋支教团的小老师,我的耳边响起一首在网上流传的《乡下孩子》的歌曲:

曾是妈妈怀里唱歌的黄鹂 / 曾是爸爸背上盛开的野菊…… / 捲一圈蓝野菜, 撇圆了小猪的肚皮 / 逮一串小鱼, 乐坏了馋嘴的猫咪 / 哦, 乡下孩子 / 生在阳光下 / 长在旷野里

与那些在田野中挖野菜、下河沟逮小鱼的乡下孩子们比,贵州山区这些上山抓蛇的孩子更为野性,也更为淳朴可爱。

“这是他的本子,还有这个。”在周明道家里,周老师的妻子找出两个旧笔记本给我看。一本是生物课笔记,讲的是生物细胞;另一本是物理备课本,上头记着光的基础知识。往后看,本子上写着这样一句话:

粉笔:耕耘中磨灭自己纯洁的身躯,理想的种子播进了青年的田埂(应为“心田”)——“田埂”一词叫人联想起那块挂在草房横梁上的锈迹斑斑的铧犁。

另外一个小本子上记着一些药方,有治支气管炎的,有治哮喘、咳嗽用的。无论是备课笔记,还是记药方的小本子,都记得非常认真,一笔一画,一丝不苟,像学习认真、成绩好的学生的作业本。

备课本,记载药方的笔记,这些遗物叫人再次想起那则比喻:蜡烛,不,还有火把。周明道既是一支照亮了乡村孩子的蜡烛,又是一束温暖了患病村民们的火把。他照亮和温暖了他人,却没有给孩子和妻子留下任何财产,最后烧掉了自己。

面前的备课本和记载着药方的笔记,在我眼前幻化成挂在草房横梁上的锈迹斑斑的铧犁……将悬挂不用之物挂上草房横梁代替上课铃是一种创造,还是别一番深意?巧用铧犁的人的苦心局外人很难得知。但有一点似可推断:代课的周明道用挂在横梁上的铧犁向世人表明了自己农民的身份。

周明道妻子说,当代课老师前,她家老汉是村子里犁耙田的好手。春夏季节,地里的活最多的就是犁田。他早上扛着犁头出门,晚上披着星星回家,来去都打光脚板,一路踩得石板咚咚响。歇工后,顾不得洗脚,先扯一把禾秆或茅草洗犁头,再洗脚。田里、土里,大老远就能听见他短促有力的“嘿嘿”的赶牛声……自从当了代课老师,这犁头没用了,就捡起来了,搁在灶房的一个角落。有一天,他突然又把犁头找出来,说是另有用处,哪晓得,是用来敲响课堂上的铃声了。

在这儿,锈迹斑斑的铧犁既代表着他的过去,也向所有的人,主要是那些掌握着自己命运的人默认了自己不可改变的宿命身份。

“去世前,他去德江检查,照了胸片,没得到印证,分析不出是得了哪样病。在医院输了1000多块钱的液,还是没治好。后来知道了,是心脏病发作死的。3月25日那天哈,很晚了,12点过了,我还在洗衣服。多年来,我一直要洗那么多衣服。”周明道的妻子,跟我讲述着丈夫去世前几天的事。洗完睡下没多久,他就醒了。他说他身上骨头软得很,他要休息一下。她说再睡一会儿嘛,天还没亮呢。他就又去睡。睡到等她天亮起床,一听没有动静,她慌了,赶忙喊他睁开灯哈。开灯后,看他就不对头了。她说你怎么了?连一点点都不动弹。她就这个喊,一喊姑娘就惊动了。姑娘说,妈,爸爸怎么了?她说快点呀,你爸爸是不行了,你快点起来嘛!姑娘睡在楼上,一个翻身爬起,梭下楼(当地方言)来,跟她一起,扶起她爸,往德江镇医院送。

哪里就好得哦,他这个人,你拿他都没办法,人在医院里头,心头还想着他学生。在德江输液时,输到还有一小点,像这点哈(她用大拇指指着第一节食指),就一小点,他都等不起。

“马上要7点钟了哈。”他说,“3点钟就开始输,输到现在,真急死个人!”

她说就这丁点了,你命都不要哈?你这丁点输完再去噻。迟点就迟点嘛,要不,就回家放假这一天哈。

他听了这话,拿眼睛凶她:“你当你是哪个,你说放假就放假哈?”

她拗他不过,只好顺了他。他就这样,一边输液,一边坚持给学生娃儿上课,上了一个月,是得心脏病死的。讲到这里,她声音哽咽,好半天了,再没说话。

“死的时候,他全身浮肿,好造孽哟。”过了好久,她又说。

周明道去世后,望海小学60多名大大小小的学生,村子里的父老乡亲,围在周老师的遗体前痛哭不止。

遗体的人殓,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延。

两个汉子抬起遗体,慢慢走向停放在的棺木。

马上就要入殓了,先前淅淅沥沥的雨水,突然下得猛

了,像是在为人殓者哭泣!受此感染,参加追悼会的人们放大了哭声。悲痛的哭声掺和着生猛的雨声,哗啦啦的,像是要把整个天地给洗涤一遍!

遗体装进棺材,雨水开始变得小些了,悼念者们却没有因此停止哭泣。默默持续着的泪水,长时间地在人们的脸上流淌,与房檐上滴答滴答的雨水交融在一起,汇入周边的小河沟,流进望海小学孩子们的心田……

巨大的悲恸中,孩子们心目中的“大海”——尊敬的周明道老师——越来越远了……

时候到了,几个壮汉矮下身子,发一声喊,合力将棺材抬离地面,就在这一刻,奇迹发生了!围着棺材的学生,好几个冲上前去,死死地攥着拴棺材的绳子不许抬上山。抬棺材的壮汉们稍微迟疑一会儿,然后咬牙,使劲,硬抬着往前走。随着棺材的前移,攥着绳子的手慢慢松开了,可有一双手,任凭你怎么抬就是不松,非但不松,还比先前攥得更紧——六年级学生杨丽不仅两只手吊着绳子,还把整个身子压了上去,两只脚板呢,死死蹭着地面,蹭了好长一截路!

周明道终于下葬了。

村里人遵照他的遗愿将他葬在了村口的山坡上。

站在村口山坡上,望得见那条通往外面世界的小路。周老师生前多次对人说过,他要让一茬又一茬的学生沿着这条山路走出大山……

“好人啊,在眼下这个世道难得找的好人哟。”熟悉周明道、两家隔得又近、中间还有些亲戚关系的村小老师张太芬谈起他,一个劲地唏嘘感慨。一人教四个年级五个班,一年级、二年级、四年级、五年级,加学前班,一共六十几个学生。那个学校——开始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学校,说实在的,有了周老师,才在一个学生家的堂屋里教书,才慢慢成了一个学校。

望海小学的校名,是青岛海洋大学支教团学生给取的。他们一心要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,希望他们走出大山、看到大海,于是将桂花小学改名叫望海小学。但它至今不能叫学校,别说操场了,连一间稍微像样的教室也没有,只有勉强安放得下桌椅板凳的简陋破败的房子。就在这样的条件下,周老师教的学生有很多后来考取了大学。可以说,他是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学校,奉献给了乡村教育事业,还奉献给了桂花村的村民,他为好多村民治过病。可他呢,每个月的工资却只有一点点。你比如说吧,在没有实行“两免一补”(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杂费、免书本费,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)、没有实行教育公用经费下拨前,他教一个学生,一个学期还可以收几十块钱,还有四五斤大米。但是自从那个教育经费下拨后,学校不准收钱了,这个公用经费拨下来又不准用于教师福利,不准用于教师工资。据村民讲,周老师的工资,有一个学期,什么都除尽后,拿到手头的只有500块钱,平均一个月100多块钱。平常呢,一个月就200多元。钱虽然很少,可周老师从来没有因为待遇差离开过学校,离开过他的学生。噢对了,有过一次,很短,十多天吧,离开十多天,马上又回来了。

2009年暑假,周老师的两个孩子,一个在煎茶中学读初中,一个读高中,花费比较大,周老师的工资又太少,实在难以承担家庭的日常开支。这时,德江县城一所学校的负责人跑来邀请周老师(因为周明道在当地上课很出名)去德江那所学校讲课。待遇嘛,比在望海小学好得多。考虑到家庭经济确实困难,考虑到妻子的艰辛,也考虑到自己转正无望,周老师就去那里上课了。人虽然去了那里,可他的心还在望海小学几十名娃儿身上。他在那边教了十多天,可心头却一直记挂着这边。当然,还有另外的原因。一次,班上那个衣着光鲜、家里头有钱的学生,在上课时大声讲话。周老师几次叫他不要讲。但周老师一转背,那孩子又讲了起来。这回像是说了一句搞笑的话,课堂上一片起哄。

他生气了,叫那孩子站起来。

从座位上站起来的学生斜着肩膀,挑衅性地看他。

他直视着面前这双稚气却明显掺杂着些许污秽的眼睛,心头明显痛了一下。他压抑住火气,让对方再说一遍。

“说就说!”那学生歪咧着嘴,“可乐。你喝过可乐吗?”

“你说什么?”他说。

“没听说吧,那肯定没喝过。”那孩子更加得意,“连可口可乐都没喝过的人,还教我们?”

他气坏了。他跟邀请他的学校负责人说,他水平低教不了这样的孩子。

负责人来找那个学生,狠狠凶了一顿。

隔日,他发觉那孩子用一种仇视的眼光看他。与这样目光对视,他的心头突然生出一种既担忧又愧得慌的感觉:为孩子父母的娇惯担忧,为自己没有教好这样的学生惭愧。

他决意要回到他的乡村学校去了。他找校方负责人表明了态度,对方只好答应,答应后又说,你什么时候想转来,我这儿随时都欢迎你。

他收拾好东西,立马往回赶。

快要走到望海小学时,他跑起来了,心跳也剧烈起来:有十多天了,他没有见到这些闭上眼睛也能辨认得出来的孩子了呀!

快要进村子时,远远地,他停了下来。他看见,全校的学生、孩子们的家长,齐扑扑地站在村口欢迎他的归来!他流泪了。他咬着嘴唇对自己发狠:再也不走了,不管什么样的学校来聘,不管人家给他多高的待遇,都不走,一辈子离不开这所学校!

随着周老师的归来,停歇了十来天的上课铃声——挂在草房横梁上的锈迹斑斑的铧犁——重新敲响,村民的堂屋里重新传出了琅琅的读书声。

周老师手握书本,走向孩子们,声音依旧,风采依旧,精气神呢,似乎就不如从前了。

渐渐地,家人们发现,上完课回到家的周明道,精神较过去似乎容易疲惫了,原先备课要到很晚的他,现在时常提前一个多小时就上了床……

与周老师日渐式微的精气神类似,那挂在草房横梁上的锈迹斑斑的铧犁声,听上去竟有些像彳亍在山区机耕道上老人拉的破车的吱嘎声……

去年,在周明道家门口,两个乡村老师碰上了。张太芬跟周明道聊了好一阵。她说周老师啊,你教书这么多年,你心里是什么想法?他说开始教书那几年,真的想挣钱,确实有很多时候都想走出去。后来由于教的时间多了,和学生有感情了,而且看到学生们考取了大学回来,对他的慰问啊,对他的鼓励啊,让他觉得这些比钱重要多了。她说我很佩服你呀,但你还是想办法把那个正转了吧,转了正像你这么长工龄的人应该有一两千元的工资了,就可以够家里用

了,因为两个孩子要读书呀。他摇摇头说,转正就是一个名分嘛,没弄到就算了。讲到这儿,张太芬叹了一口气,用手背在眼睛上揩了一把。代课21年没得到转正,他的孩子又没有成年,所以在煎茶中学的时候,碰到他的两个孩子的班主任,张老师就跟他们讲,凡是上面有什么资助,都尽可能